

论《连环套》中霓喜的姘居叙事与女性主体性困境

祁同悦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qitongyue2023@163.com)

摘要: 张爱玲在《连环套》中以霓喜的婚姻轨迹为脉络, 突破“受害——反抗”的二元叙事框架, 刻画了霓喜这一反抗与妥协并存的复杂形象, 戳破了女性觉醒的虚妄性, 展现出经济压迫与性别规训交织的女性生存困境。《连环套》“中途夭折”的未完成性, 和主人公霓喜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婚姻形成同构隐喻。霓喜的姘居叙事呈现出多样的文化维度, 张爱玲以参差对照的笔法解构了“堕落女性”的传统标签, 让霓喜在妥协与挣扎的裂隙中, 显映出旧时代女性主体性的复杂光谱。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观; 姘居叙事; 《连环套》; 霓喜

引言

《连环套》是张爱玲于1944年在《万象》杂志上连载的中篇小说, 讲述了主人公霓喜辗转于三个男性之间的沉浮命运, 以及男女姘居的婚姻选择。《连环套》的发表引发了沦陷区文坛关于张爱玲的一系列论争。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连环套》严苛的批评, 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极具争议的公案。他指责《连环套》“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1], 语言也流于纯粹趣味性的路子, 缺少斗争性。张爱玲也写了《自己的文章》一文进行回应, 表明了自己创作《连环套》时所坚持的思想主张。《连环套》这部诞生于上海沦陷区、被傅雷斥为“内容贫乏、技巧过剩”[1]的作品, 实则蕴含着张爱玲对战时女性生存困境的尖锐省思。同时, 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殖民现代性与传统宗法制度交织的香港, 这个特殊的场域也是观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主体性困境的绝佳标本。《连环套》“中途夭折”的未完成性, 也和主人公霓喜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婚姻形成同构隐喻, 霓喜的姘居叙事呈现出复杂的文化维度, 既反映出父权制度下女性作为“商品”的婚姻交易链, 以及觉醒的虚妄性, 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对传统观念中的“堕落女性”标签进行了解构。

1. 父权制度下姘居女性的婚姻交易链

霓喜的三段姘居关系, 始终围绕着赤裸的经济契约展开。霓喜最初是被卖进印度商人雅赫雅家, 就像罗列的商品被挑挑拣拣, 确认好无瑕疵后才被出售。经过买卖双方严谨地讨价还价后达成的交易数字, 已超越了普通物价的范畴, 成为霓喜作为商品价值的量化, 张爱玲精确地将这段关系锚定在交换中。与药店主人窦尧芳姘居后, 霓喜又陷入了封建宗族传统的牢笼。窦尧芳临终后, 霓喜和她的孩子们又遭到了窦家族人的驱赶, 不仅失去了名分, 亦没有得到遗产, 再一次暴露了姘居关系的脆弱性。正如张爱玲尖锐指出的: “姘居的女人像当铺里的流当品, 标价再低也带着可疑的来路”[2]。这种道德污名化的本质, 是父权社会对游离于婚姻制度外的女性进行价值贬损的话语策略。不同于张爱玲《倾城之恋》中主人公白流苏通过婚姻契约获取的长期保障, 霓喜在这几段姘居关系中始终处于按需续费的生存模式, 她的身体价值随着男性投资者的兴趣而涨跌。这种即时性的交易特征, 在霓喜与英国商人汤姆生的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汤姆生从未给予霓喜婚姻承诺, 而且在国外秘密结婚后, 仅用金钱就终结了与霓喜的这段关系。“姘居”身份的临时性使得男性拥有可随时终止关系的单边特权, 雅赫雅的商人精明、窦尧芳的宗族传统、汤姆生的殖民者身份, 不同男性角色都成为权力压迫的主体, 霓喜在三个男人间的辗转, 恰似货币在不同市场的流通。《连环套》中的“连环套”不仅指霓喜不断陷入与男性的姘居关系中, 更象征着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循环压迫。

有趣的是, 傅雷曾批判《连环套》“心理描写缺失”, 这恰是张爱玲的叙事智慧。当女性的内心世界被经济契约蛀空, 霓喜在绸缎庄被伙计们以“楼上的”代称, 连抛头露面都成禁忌, 这些细节比任何心理独白都更残酷, 因为它们揭露出父权交易链里女性的商品化人格, 其价值随男性“投资者”的兴趣涨跌。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性不仅是物质层面的, 更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所强加的必然结果。霓喜一生与不同男性存在

婚姻或情欲关系，这些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经济交易，霓喜通过身体和情感换取生存资源，展现了女性身体与情欲的工具化。霓喜的“原始生命力”在男性凝视下被物化，这不仅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性，也使她们陷入了一种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境。

2. 女性觉醒的虚妄性——霓喜的挣扎与妥协

《连环套》中的姘居模式看似是霓喜主动的婚姻选择，实则是走投无路的“被挑选”命运，霓喜面对不公与专制所做出的挣扎都无法使其摆脱现实的局促。雅赫雅在绸缎庄初次打量十四岁的霓喜时，与顾客检验布匹质地的姿态如出一辙。被雅赫雅驱赶之后，霓喜自认为最具自主性的时刻，也不过是抱着孩子希冀男人回心转意，念念旧情，自己也多得些钱财。但最终被雅赫雅抛弃的霓喜，失去了生命的依附，而她选择进入药房主窦尧芳的家门，也不过是重复了十几年前被雅赫雅收留的旧路。从雅赫雅的绸缎庄到窦尧芳的中药铺再到汤姆生的别墅，这种看似自主的选择实则都是沿着预设的轨道滑行。小说的这种循环叙事揭示了女性的自由始终限定在“被选择”的范围内，如同困在玻璃瓶中的飞蛾，看似振翅挣扎，实则未曾突破牢笼。

三段姘居生活中，始终贯穿着霓喜对争取“太太”名分的执着。小说中的多段冲突描写就是关于霓喜试图索要一个正经的“太太”名头，这种名分的认可像一顶帽子，承载着当时女人的安全感和体面，而事实上霓喜只是一个可怜的工具，被利用之后即被抛弃。霓喜会向雅赫雅索要那一纸婚姻，也会在窦家人侮辱自己是“私姘”的女人时，大声哭喊窦尧芳是“我的人”、“我丈夫”，这些都暴露出姘居女性对父权符号的依赖。在相继被两个男人打破幻想之后，“她低头看着自己突出的胸膛，觉得她整个的女性都被屈辱了，老头子骗了她，年轻的骗了她，她没有钱，也没有爱”[3]，霓喜固然知道自己的现实处境，但一切反抗却是无效。“成功”的幻影让霓喜与“乡下”的距离逐渐疏离，她试图从虚无之境中唤醒原本缺失的生命传奇，但顷刻间就消散无踪，她重被抛回黑色的贫穷中[4]。霓喜并没有得到姘居应有的地位，赛姆生太太虽为中国女性，却使用着经过调整的西式名字，她的第三任丈夫汤姆生禁止她沿用本姓，甚至连她当下的名字也并非真实本名。在小说开篇的细节描写中，霓喜珍藏的三张单人照片颇具深意。这些照片分别记录了她的三任伴侣，却始终缺少一张象征婚姻完整的合影。因为在三段关系中，她始终为能获得真正的身份认同，绸缎庄伙计们对她的称呼尤其耐人寻味，“楼上”这个模糊的代称，既折射出姘居女性在社会空间中的尴尬位置，也暴露出父权制度对非婚关系的刻意回避。在窦家，霓喜没有被认作真正的女主人，而是当做不能轻易露面的存在[5]。

小说最后，三十一岁的发利斯向霓喜的女儿瑟梨塔求婚，这个十三岁女孩的境况也暗示了女性命运的轮回。这个场景与当年雅赫雅买下少女霓喜的情形形成闭环，女性的任何的挣扎都不过是“连环套”中的暂时喘息。这种代际复制不仅是个人命运的重复，更是整个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延续，揭示了父权制度的顽固性和压迫性。霓喜越是努力用身体和情欲突破自己的生存困境，就越深陷命运的泥沼，越是试图通过身体交易获取自主空间，就越成为男性的工具，这似乎在说明着姘居女性的所谓“选择自由”，终究是父权社会精心设计的生存幻觉。小说对传统女性书写的突破了“受害——救赎”的二元叙事。霓喜既不是祥林嫂式的悲剧符号，也不是曹七巧般的恶魔化身，而是混杂着精明与天真、反抗与妥协的复杂存在。

3. 姘居与“堕落女性”标签的解构

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提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没有中心思想，内容贫瘠，也没有逻辑和心理刻画。张爱玲对此给出回应，她提到自己不太注意理论，将文学理论置于文学作品后边，认为作者要从作品中汲取理论，作品和理论是同样重要的；其次是作家普遍忽略人生中安稳和谐的一面，而过多将重点放置在人生的斗争中，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6]。斗争也是为了追求安稳，安稳的实质是一种永恒。没有安稳作为作品的基础，斗争呈现的强有力，会予人以兴奋，但却不能予人以启示。这就造成一些作品中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7]。霓喜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她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野草，没有功夫演绎悲壮，只知道用最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每寸阳光。她贪财、市侩，甚至有点泼皮，但当窦家人要把她赶回乡下时，那句“非回去不可么？”里的茫然哀悯，突然让人意识到被“堕落”标签掩盖的真实体温。《连环套》中充斥的一种悲凉的底色，这也是张爱玲写作风格的体现。张爱玲不喜欢壮烈，更喜欢苍凉，壮烈因为有力而缺乏美，缺少了人性。悲社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对比，苍凉才具有更长远的回音，这也是一种更具有启示性的参差的对照。

在小说主题方面，因为采用参差对照的写法，而非采取善与恶，灵与肉冲突的古典写法，所以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张爱玲主张“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现代文学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6]。”《连环套》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写出的，所以小说中霓喜颇受争议的姘居行为也有了更加复杂的含义和更大的解读空间。张爱玲说过：“霓喜的故事，使我感

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6]。”她认为霓喜是有生命力的，虽然人生经历起伏波荡，但是直线形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够直接了当追求物质。霓喜立志成为一个有身份的太太，她会做应酬，也是为了赢得雅赫雅的心，让雅赫雅知道自己也可以做他的左膀右臂，她听说发利斯擅长做生意，就赶紧奉迎。霓喜从未放弃过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欲望的追求，她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去选择和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野生泼辣地生长着。霓喜不为任何人付出自己的真心，但拥有自己的生命实感。面对窦家人的驱逐，霓喜在思考着是否回到乡下的问题，“非回去不可么？霓喜对自己生出一种广大的哀悯[3]。”最终霓喜抱着四个孩子，疲乏地离开了窦家。女性身体的能量波动在小说中有着多次描写，在离开雅赫雅家的时候，霓喜也是结束了一场乱战和争吵，拖着一副疲惫的身躯：“霓喜将洋钱掷在地上，复又扯散了头发大闹起来，这一次，毕竟是强弩之末，累极了，饶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也觉体力不支，被众人从中做好做歹，依旧把洋钱揣在她身上，把她送上了一辆洋车[3]。”每次姘居的结束都是对她生命的一场消耗，但霓喜总能站起来加入另一场战斗中，“家里儿啼女哭，乌糟糟乱成一片，身上依旧穿孔光鲜，逐日串门子[3]。”霓喜虽然没有刻意去反叛所处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但是却能够依照自己的生命本能活着。她看到第一任丈夫雅赫雅和别的女人偷情，她敢于和雅赫雅直接硬刚；在和雅赫雅的偷情对象于寡妇大打出手的过程中，霓喜旺盛的精力和泼辣的气势还使她占据了上风，展现出女性最本真的生命力，反而更接近“人性”。

张爱玲大胆书写姘居男女，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沦陷区背景下，这样的主题难免会被人诟病为缺少斗争性。关于“姘居”，张爱玲做过这样的解释：“过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过日子的。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5]。”她说和霓喜姘居的男性，也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无特殊心理，甚至带有真情。这些观念在当时固然是大胆且充满突破性的。张爱玲探讨了男女姘居这种婚姻模式的可能性，打破了姘居一度以来的污名化，给予了处于经济弱势的女性以多面化的表达。

4. 结语

张爱玲的《连环套》以其未完成的文本形态与霓喜未获归宿的人生形成互文，共同指向战时殖民语境下女性生存的本质困境。霓喜辗转于雅赫雅、窦尧芳、汤姆生之间的三段姘居关系，揭示出其婚姻选择表面下的经济契约本质。她的身体与情感被锚定在赤裸的商品交换逻辑中，呈现了父权制度与殖民经济交织下女性的被物化。张爱玲以日常化的姘居叙事，解构了宏大的斗争话语与道德批判，直抵战时女性在夹缝中求生的卑微实相。张爱玲以苍凉而非壮烈的美学笔触，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复杂女性形象，其困境至今仍是对性别权力结构的尖锐诘问，霓喜的“未完成”状态，恰是其主体性困境最深刻的隐喻。

参考文献

- [1] 迅雨. 论张爱玲的小说[J]. 万象, 1944, 3(11).
- [2] 张爱玲. 流言[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 [3] 张爱玲. 连环套[M]//张爱玲全集: 第六卷.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262-326.
- [4] 乔向东. 从缺失中引出生命传奇——由被腰斩的《连环套》和一次争论看张爱玲的小说世界[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5(3).
- [5] 王艳丽. 解读《连环套》中霓喜的人物内核[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6).
- [6] 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M]//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173-177.
- [7] 高佳嘉. 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艺观——试析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体现出的创作观[J]. 名作欣赏, 2009(26): 87-89.